

恩
心

陈飞 杂文选
第二集

陈飞杂文选

PDG

我写杂文十九年(自序)

我的“杂文龄”仅 19 年。从 46 岁才开始写杂文，比起杂坛的许多文友来，显然是起步晚了。但对我来说，迈出这一步却着实不容易。

我的父亲赵慕鸿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当年在广东省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 41 岁(1946 年)即死于肺结核病，我年仅 13 岁。对父亲的敬重与思念，为我日后献身新闻事业播下了种子。16 岁，当我满怀激情参加地下党领导下的学运时，内心深处更是把“革命”二字与地下室、秘密报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广州解放后我旋即加入了解放军的行列。很快我被分配到师报工作，不久军报出版，我又到了军报。54 年部队女同志大批转业，我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58 年毕业，我迈进了《天津日报》社的门槛，直到 88 年(55 岁)离休，又一直返聘至今。一句话，我这辈子，学的、干的都是新闻，我的生命与新闻事业无法分开。

我是记者出身，也当过编辑，当过评论员，当过正、副部主任，但最终却定位在杂文上。79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神差鬼使般迷上了杂文，到了 85 年以后，编杂文、写杂文完全成了“正业”。在报社内部，这样的“转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甚至算不上工作调动，但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其实是个质的变化。

应当说，我一直是勤奋的，工作努力，业务熟悉，有“快手”、“多面手”之称，也有过一些“先进”的头衔，报上发表的消息、通讯、文章、评论，更是难以数计。但是，经过“文革”的冲击，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致命弱点，即思想上的愚昧与盲从，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我的许许多多作品，不论写好与写坏，属于自己的思想都太

少太少了。而“文革”最惨痛的教训——“造神运动”，其土壤正是亿万人民的愚昧与盲从。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有责任首先摆脱自身的愚昧与盲从，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用自己的笔写自己要说的话。当然，这“自己的”的，决不是随心所欲，标准是明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决不是任何长官意志。对我来说，认识到这一点，经历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漫长过程，但一旦思想通了以后，我将义无反顾地往前走，而杂文这种最富有个人色彩的文体，则是一个最理想的载体。

在长期的杂文写作实践过程中，我对自己作了如下定位：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结。我常常想，中国老百姓是最勤劳、最善良的，他们奉献最大，索取却最小，他们最可敬最可爱，有时又是最可怜。我愿用自己的秃笔，去认真记录平民百姓的憎与爱，苦与乐，忧与喜，现实与希望。我自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平民的一分子，又始终生活在平民当中，我的思想感情与广大平民百姓是息息相通的，我愿坦率敞开自己的心扉，真诚对待广大读者。当然，写文章总得有所遵循和约束，我无法例外，遇到不该谈论的题目或不该说的话，我主张采取回避的态度。总之，我要求自己讲的都是真话，有些话宁可不讲，但决不讲违心的假话。我愿以此自勉与自律。到底这个定位准不准，做得怎么样，有待广大读者去评论。

我还认为，人的脾气禀性各有不同，杂文的形式风格也无法一样，应当允许各种风格并存，不必强求一律。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古板，严肃有余，幽默不足，这种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我的写作风格。我给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力求思想敏锐、深刻，文章有新意，有深度，语言明快流畅，感情融于笔尖，力争以情与理打动读者，与读者进行无障碍交流。这个要求其实不低，我自己也远远没有达到，需要继续作不懈的努力。

应当说明的是，我虽认为自己的杂文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决

不是说，自己的杂文就是上品，更不是说，自己的风格就是标准。杂文不需要千文一面。作为读者，我同样喜欢一些幽默风趣、亦庄亦谐的文章，欣赏作者妙语连珠、举重若轻的本领，尽管我自己做不到。总之，我清楚自己文章的局限性，决不敢苛求读者都喜欢自己的文章——只求拥有一部分读者，文章就没有白写，于愿足矣。

本书是我的第二本杂文集子。第一本集子出版于1990年9月，两书相距8年。本书收入这期间发表的文章132篇，按文章的内容分类，不以发表时间排先后。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即：（一）领导者形象；（二）抵挡不住的经济大潮；（三）人生百态素描；（四）“龙文化”及其他；（五）老·养老·敬老。这些杂文，多侧重于对社会现象进行褒贬，尤其着意于对各类人物的心态进行剖析。九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发展的时期，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猛烈冲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浓重的经济色彩，也必然反映到杂文中来。即便是谈文化的篇章，也难以摆脱与经济生活的千丝万缕联系。也许，这就是杂文的时代烙印吧。

本书还收入了一篇题为《难舍的追求》的通讯。通讯较详细地介绍了我个人从事新闻工作近半个世纪的酸甜苦辣与是非得失。作者为《天津日报》社文艺部编辑宋曙光，他应《天津群星谱·新闻卷》编委会的委托，花了很大功夫写成该文。现该书正在付梓中。为了使关心我的读者增加对我的了解，不避“卖瓜”之嫌，也将这篇通讯收入本书。

最后，我还要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新华印刷二厂及我的文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与鼎力相助，这本书也是无法问世的。

陈飞（赵虹）
写于1998年6月

目 录

领导者形象	
十个副导演与十一位副局长	(1)
让谁满意?	(3)
眼睛向上与向下	(5)
拜年的“路线”	(7)
谈“微服私访”	(9)
许诺与许愿	(11)
“内举”不可取	(13)
管好您的家属	(15)
如此“结义”	(17)
“傍大款”与“结穷亲”	(19)
“傍大款”者该猛醒	(21)
“钟馗”在干什么?	(23)
学问与文凭	(25)
“雇主”与“枪手”	(27)
“杀回马枪”	(29)
杨乐辞官	(31)
老百姓最关心一个“严”字	(33)
说“罢宴”	(35)
堂食客	(37)
怎一个“陪”字了得	(39)
以房为镜	(41)
陈景润没有车	(43)

“轿车进入家庭”讨论存疑	(45)
何物“会务费”	(47)
贪官与作假	(49)
当高产指标未完成时	(51)
对“达标”的思考	(53)
“一车人种十六棵树”的另一面	(55)
蚂蚁式的辛劳	(57)
授勋与死刑同时执行	(59)
“回车巷”前说争让	(61)
平庸是“德”	(63)
抵挡不住的经济大潮	
房子·票子与靶子	(65)
重奖的学问	(67)
球海人的重奖观	(69)
向谁倾斜？如何倾斜？	(71)
职务≠贡献	(74)
“错位”与“归位”	(76)
重提“爱厂如家”	(78)
莫忘老劳模	(80)
一尊塑像引出的话题	(82)
竞争与道德	(84)
“金胆事件”	(86)
“蚂蚁”的价值	(88)
模仿与创造	(90)
“下海”漫议	(92)
“鸡”耶？“鸭”耶？	(95)
慎“跳槽”	(97)
善待“跳槽者”	(99)

面对“洋破烂”	(101)
女大学生伴舞之忧	(103)
“黄金宴”	(105)
“乱花钱是一种罪恶”	(107)
真正的“开心果”	(109)
我只有张口结舌	(111)
冷眼观斗富	(113)
摆阔者的心态	(115)
“穷庙富方丈”心态评析	(117)
“王海现象”——打假福音	(119)
贺“侏儒酒吧”停业	(121)
“背水一战”都能扭转乾坤吗?	(123)
无情的“多余物”	(125)
人生百态素描	
唱好“今日歌”	(127)
“秒管理”	(129)
“平常心”漫议	(131)
无人喝采?	(133)
血染的风采最壮丽	(135)
假佛 假罗汉 假人	(137)
AA制与不怕当“吝啬鬼”	(139)
“财神”乱弹	(141)
闲话“生日蛋糕”	(143)
B超的功与过	(145)
“阴盛阳衰”咏叹调	(147)
雏鹰与风筝	(149)
“大款儿女”感怀	(151)
成年·成年仪式	(153)

罗汉·烈士·可塑性	(155)
家乡的云吞面	(157)
“13”这个数字	(159)
灵芝也会被虫蛀	(161)
“宫廷秘方”又如何?	(163)
“质本洁来还洁去”	(165)
让生命得以延续	(167)
祖国何处不安魂	(169)
花圈的“升值”	(171)
打狼	(173)
薛宝钗的批评艺术	(175)
赞王熙凤当“监社御史”	(177)
“伯牙摔琴”的误区	(179)
蝙蝠的尴尬	(181)
火红的石榴树	(183)
说不尽的铁拐李	(185)
“龙文化”及其他	
“龙文化”辩	(187)
永恒的妈祖	(189)
高山与粪土	(191)
临晨即自鸣	(193)
“有钱”与“有文化”	(195)
整旧如旧	(197)
巴顿将军与汽车	(199)
书是什么的?	(201)
《误诊学》的可贵之处	(203)
拒绝“天价”	(205)
“炒”死人之风当刹	(207)

“与蛇同居”和“冒险精神”	(209)
邮票与君子兰	(211)
贺某大型“人造景点”流产	(213)
给“体育热”加加温	(215)
黄山保洁的遐想	(217)
狗年说“宠狗”	(219)
电子宠物与“爱心培养”	(221)
片名误我	(223)
虚实“与狼共舞”	(225)
“爱神”独钟改革家?	(227)
“后妃热”该降降温了	(229)
不光针对主持人	(231)
“临急抱佛脚”并非万全之策	(233)
魏延生来有“反骨”?	(235)
面目全非的李夫人	(237)
“霍去病与霍元甲是一家子吗?”	(239)
历史剧要对历史负责	(241)
老·养老·敬老	
说老三题	(243)
老妻·老狗·老本	(245)
老伴与“老拌”	(247)
人到老年避“三闲”	(249)
新蕾与老树	(251)
学会遗忘	(253)
愿您“安全着陆”	(255)
从副司令员到小船长	(257)
蹬三轮引起的风波	(259)
家庭赡养协议书及其他	(261)

回报母爱	(263)
赞美“孝星”	(265)
附录：难舍的追求	(267)
——记赵虹		

领导者形象

十个副导演与十一位副局长

一部电视剧，除导演外，竟有十名副导演，如此庞大的导演班子，究竟是福还是祸？湖南省一个县，不及百人的县粮食局，竟有副局长十一位，连同正局长，不多不少正好是一打。

也许是杞人忧天，我竟为此发起愁来了：如此庞大的领导班子，到底该怎样进行工作？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作了以下设想：

一种是，班子虽号称十一二人，但其中不乏挂名者。即有若干人徒有虚名而没有承担具体工作。如属此情况，则班子实际上未必庞大，大班子派生的各种矛盾也未必存在，这倒也叫人舒了一口气。只是这又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不能到位，又何必挂名？挂了名，若有成绩，也得一份，岂非无功受禄？若出了问题，也难免挨板子，岂非代人受过？不管何种情况，似也并不公平。

另一种情况是，班子中人都是有职有权，都想伸手抓工作。这样，虽说“人多势众”，但也决非“人多好办事”那样简单，相反的，倒又派生出若干新问题来。首先是领导班子自身的统一思想。十一个人，虽同为正副职，想法却可能大相径庭。要统一这些人的思想，又谈何容易？不仅得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且由于水平、素质、心态等的差异，往往费尽周折，也难以统一。而班子思想不统一，“领导”则无从谈起。仍以导演为例。影视圈向来有“导演中心”说。一个中心，众星拱月，事情好办，导演的意图不难贯彻，而“中心”多达十个或十一个以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多中心实际是无中心，叫

“星”们围着谁来转？若是“中心”之间矛盾重重，南辕北辙，“星”们就更无所适从了。多头领导，实质就是取消领导。其最终结果，或是多套马车，四分五裂，或是混战一团，彷徨无主。

因为不是圈中人，身为正导演是否有苦恼，我无从得知。但那个县的粮食局长，就的的确确叫苦连天了。他说：“我这个粮食局的领导班子，最多一正三副就够了。现在安排了这么多的局长、副局长，造成许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或者决而难行。”用群众的话来说，那就是：“庙小菩萨多，管事的不管人，管人的不管事。”领导者的数量与工作效率，不是 $1+10=11$ ，而是 $11\times 0=0$ ，或是乘以负数，得到更大的负数。这种结果，就太可悲了。

对那位粮食局局长的苦恼，我深表同情。并以为，解决之法，只能是“动手术”，割掉多余的“息肉”。对于只有“关系”而没有水平的不称职者，当然要坚决撤掉；就是有本事的“菩萨”，只要在这个庙里处于“多余”的位置，也要毫不犹豫地搬掉，搬到另一所“菩萨”不足的“庙堂”里去。

《时代潮》杂志 93年8、9月合刊

让谁满意？

身为国家公务员，自身的一言一行，该以什么为准则？换句话来说，该让谁满意？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不久之前，《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五位优秀公务员的先进事迹。他们是“秉公执法的模范公仆”景志刚、“公私分明自不凡”的袁庭钰、“山乡‘孺子牛’”杨凤岐、“反腐败勇士”姜瑞峰和“建好一支队伍，确保一方平安”的李文喜。这些来自工商、税务、民政、纪检、公安部门的普通公务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在各自的岗位上，勤政爱民，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让人民满意”这五个闪光的大字，就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和人生写照。

是的，身为国家公务员，不论职务高低，分工如何，都应力求做到处处“让人民满意”。这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也有人并非如此。

一种是只求上级“满意”，不问人民是否满意，甚至为了迎合某些上级的“要求”，不惜牺牲人民利益。

本来，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在正常情况下，上级的要求集中了人民的意愿，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也有若干例外。比如，某些决策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因具体情况的差异，这些决策对个别地区、单位并不适合；某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独断专行，决策本身存有错误；个别领导自身存在这样那样问题，甚至已腐化变质，进而导致对下级的错误要求……如果出以公心，对于有损人民利益的要求，不管来自何人，都应坚决拒绝，按照组织程序予以正确解决。但是，一些干部并不如此。虽明知上级的“要求”不对，但为了“保官”或“升官”，不惜牺牲人民利益而违心地执

行。更有甚者，阿谀奉承，投其所好，不仅执行且扩大其负面效应。而“上级”的背后则是不折不扣的“自我”。

另一种是优先照顾亲友的“要求”，把“让亲友满意”放在首位，至于人民是否满意，则对不起，忘掉了。

人都有三亲六故、挚爱亲朋。他们又都不是生活在真空，往往把各种要求摆到你的面前。这里，自然有不尽合理的，甚至是与国家的法律、政策直接相悖的。如何对待这些要求？是无原则迁就，还是按照国家政策、法律办，把人民利益置于亲情之上，索性来个“六亲不认”？五位优秀公务员之一的杨凤岐，作出了好榜样。

杨凤岐是一个乡的民政所长，“官”不大，但有实权，他经手的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福利发展资金等，数字相当可观，还有福利企业的就业指标，先后达五六百个之多，他都一一秉公对待，对找上门来求他的亲友，从未开过方便之门，甚至不惜得罪了自己的亲姐姐。亲友们视杨凤岐为“无义”，但这是可贵的“无义”！有了杨凤岐这个参照系，那些把亲情置于原则之上，以亲疏厚薄作为办事标准的做法，自然显得黯淡无光了。可惜的是，摆错亲情位置的，并非个别人。而亲情的背后，同样离不开一个“私”字。

“让人民满意！”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愿所有国家公务员以此自律、互律。

天津日报 96.10.23

眼睛向上与向下

一日，友人说起一个古代笑话：某裁缝手艺颇佳，尤擅长为官员缝制衣袍。他经手做的长袍，大小官员穿了都觉得合体。问他有何诀窍，他说：当官的走路昂首挺胸，眼睛向上，给他们缝袍子，就得前长后短，穿到身上自然恰到处好。听罢不禁捧腹大笑，拍案叫绝。

眼睛向上还是向下，把百姓放到什么位置，恐怕是为官优劣的分界线。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将最终赢得百姓的热爱。即使斗转星移，也是口碑永存。游浙江杭州，在为秀丽的西湖景色倾倒的同时，我深为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关心人民疾苦的事迹所感动。有文运而无官运的苏轼，在杭州是个小小知府，时间也不长，但他救灾赈民、开河浚湖、修筑长堤等，为百姓办好事实事，深得百姓爱戴。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他筑的堤被称为“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为西湖十景之一，杭州的两条主要马路还取名为“学士路”、“东坡路”，老百姓还为他建祠、立碑、塑像。无独有偶，在海口市，有个“五公祠”，苏轼也跻身于“五公”之列，他在流放海南期间为人民所做的好事，也将永远铭记在海南人民心中。

苏轼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千年，但苏轼的形象仍然屹立在人民心中，相反的，多少帝王将相早已为历史所遗忘。可见，民心所向，并不取决于官阶的高低大小。

眼睛向下，心目中有人民，其实不仅是为官之道，也是为人之道。为商，为工，为文，为……无非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为人的宗旨却不应有异。试看为商，经商赚钱无可非议，但要手段正当，利国利民，这里同样也有“眼睛向下”的问题。读报得知，全国 20 万家豪

华娱乐场所(以下简称“娱乐城”)中,近日倒闭、合并的,已达1至2成。消息并不令人意外。我甚至有几分幸灾乐祸,并认为倒闭合并还在继续,“低谷”尚未到头。为什么我作如见观?缘于这些“娱乐城”的消费过于超前,远远脱离了我国尚不富足、近亿人民连温饱也未解决的实际。以天津市为例,最低工资是210元,月收入500元即可称中等,也就是说工薪族辛苦一个月,连逛一次“娱乐城”的开支都付不起。如此畸形消费,又岂能久长?随着反腐倡廉活动的深入,公款消费的市场越来越小,大款们“斗富”的狂热也日渐冷却,“娱乐城”理所当然要失去昔日的风采。与这些“娱乐城”老板相比较,一些建筑商主动把目光从“别墅热”转向老百姓居住的宿舍楼,就显得明智多了。别看宿舍楼产值、利润较“别墅”低,但“薄利多销”的结果,收获也不菲。既为政府与人民所欢迎,又可发财致富,何乐不为?

归根结底,要摆正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再伟大的天才,也是一滴水珠;而人民,才是浩瀚的海洋。只有真正眼睛向下,关心人民疾苦,把个人发展与人民利益紧紧揉合在一起,个人才有真正的前途。历史的结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重庆《杂文月报》95年2月

拜年的“路线”

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一股给上级拜年的不良风气。一些人眼睛总是向上，只盯着领导干部、领导机关，门坎越高，跑得越欢，厚厚的年礼（决不限于土特产或水果之类）一个劲往上送，唯恐礼数不周。相反的，对自己管辖下最需要关怀、照顾的困难地区、困难单位、困难群众家庭，则足迹难及，少有兴趣。群众不无调侃地说：现在，拜年也讲“路线”啰。“上层路线”就是吃得开……

拜年走“上层路线”，不是没有缘由的。不管表面理由如何，骨子里无非是看中了领导干部、领导机关手中的权——拜年送礼是手段，为的是讨上级欢心，以便打通关节，图个日后办事方便。甚至是目标明确，实有所求。前几年不是很流行“感情投资”的说法么，投资在前，获利在后，若“投资”得巧妙，可望一本万利。而春节正是“感情投资”的绝好时机。拜年送礼，理由冠冕堂皇，收礼者也无须羞羞答答。于是，拜年送礼风也就日渐蔓延开来。

当然，也有人不买这个帐。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江西省委书记吴官正，去年12月25日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郑重宣布：“请各地、市、县的同志切切不要到省里来串门送礼”，为表示他本人和省委、省政府的决心和诚意，他向来自全省的四百多位代表深深地鞠躬……

我仿佛亲眼看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并深深为吴官正的凛然正气所感动。被“拜”者如此断然“谢客”，“拜”者该知趣不上门了吧。

吴官正在“谢客”词中还“拜托各位把精力放在关心并切实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要求他们“多串串群众特别是困难户、特困户